

“一带一路”语义场域的构建路径探究

——基于亨利·列斐伏尔的语义场域理论

张海防

【摘要】 语义场域是由象征、形象、符号、信号等语言要素组成的关系性表意场所。在资本主义语义场域中信号已经取代了神学、理性主义和人性论,成为新的“普照之光”,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些西方媒体用所谓“掠夺资源”“缺乏环境意识”等虚假谎言,刻意妖魔化中国企业的形象,致使一些项目折戟海外市场。“一带一路”语义场域是破解信号语义场域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语义场域的构建路径是,用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昭示未来的美好生活世界,用纪念碑式中国象征表达美好生活世界的意蕴,用艺术性的中国语言表述美好生活世界,用精准的中国信号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关键词】 语义场域;艺术;“一带一路”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能指符号具有表意功能;汇集了众多能指符号的杂志、报刊、书籍等文本形式,表意功能尤为强大。列斐伏尔、罗兰·巴特、瓦尔特·本雅明、皮埃尔·布迪厄等人,对此观点持有异议。他们认为,象征、形象等非能指符号与能指符号一样,具有超凡的表意功能;房屋、街道、村庄、城镇、城市等日常生活场所,亦是能被漫游者阅读的表意“文本”。在罗兰·巴特那里,“城市是一种话语,而且这种话语是一种真正的语言,是城市讲给它的居民们听的,也是讲给我们的城市——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听的,方式则不过是居住其中、游荡其中、观览其中。”^①列斐伏尔认为,人们可以阅读大街“文本”,因为“大街是一本打开的书,或者说,一张报纸:它有消息、陈谷子烂芝麻、奇谈怪论、广告”^②。质言之,城市及其街道皆是语义场域。“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建造诸多大街、桥梁、港口、城市等,生产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亦即一种蕴含着各种语言符号的关系性表意场所。

一、语义场域:关系性的表意场所

社会关系并非一种孤立的存在物,它体现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固化在社会空间里。社会

张海防,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视域中‘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研究”(19BKS130)阶段性成果。

①[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6页。

②[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00页。

空间既有物质性内容,又蕴含着某种文化意义,即语义。语义场域中非词语性的象征、形象与词语性的符号、信号,共同生成了体现社会关系、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语义。

1. 语义场域中包含着象征、形象、符号、信号等语言要素

象征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符号,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包含着感性存在物和意义两个因素。黑格尔说:“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①例如狮子象征刚强,狐狸象征狡猾,圆柱体象征永恒,等等。形象是指能煽动人们感情活动的真实或想象的形态、姿态,包括人物形象和事物形象。刘胡兰、黄继光等是真实的人物形象,《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等是虚构的人物形象。“形象具有一种内在的煽动性特征”^②,能唤醒情感、感觉、欲望,迫使想象力担保它期盼的未来以及做出的决定。词汇是典型的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无内容的语言,变成了陈词滥调和花言巧语。不过,语言符号并非实在的图像,允许游戏和想象。语言如同儿童玩耍的游戏或人们常玩的其他各种游戏一样,其意义产生于遵守游戏规则的应用过程中。^③人们遵循着语法、句法规则,将众多孤立的词汇符号编纂成具有意义的语言系统。信号是一种语言,没有声音,只有被随意赋予的意义。信号的逻辑是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形而上学逻辑。虽然在红灯和绿灯之间引入了中间性的黄灯,但是它引起了诸多争议,增加了信号的复杂性。象征、形象、符号、信号四种语言元素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共同组成了日常生活的语义场域。

2. 语义场域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所

日常生活场所是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空间是人们生产和创造的空间产品,“(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④。社会空间既非机械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空间,亦非唯心主义者声称的精神空间,而是对前两者的辩证综合,即感知的(the perceived)、构想的(the conceived)和亲历的(the lived)三位一体空间。大体说来,“感知的空间”是指人们生产和创造的物质空间,即人化自然界。“构想的空間”是科学家、规划师、城市学家、技术官僚等人创造的符号空间。“亲历的空间”是人们理想的日常生活空间,它与艺术与美学相关,“倾向于非词语的象征与符号”^⑤。易言之,社会空间既是物质的又是文化的,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是蕴含着语义场域的总场域,涵盖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生态场域等内容。语义场域是文化场域的子场域,语言隶属于语义场域。“因此,语义场域和语言是我们称之为实践或者‘总场域’的总体经验的两个层次。”^⑥

3. 语义场域中弥漫着社会关系

语义场域与磁场、引力场等物理场类似,皆是某种力量发挥控制作用的空间范围。物理场的力来源于物体之间的吸引和排斥作用,语义场域的力源自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国家权力经由社会关系传递和扩散,渗透进象征、形象、符号、信号里,将语义场域粘合为一个意义整体。作为日常生活空间,语义场域中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一种空间性存在物,若没有空间作为载体,它就会变成一种抽象物。它存在于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领域,也固化在社会空间中,尤其是撒播在语义场域里。它既构序和塑形语义场域,又是语义场域的核心意指。张一兵说:“在这一点上,这个社会空间很像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场的概念,我自己在多年以前也提

①[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0页。

②H.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London: Verso, 2002, p. 289.

③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5页。

④[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40页。

⑤[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59页。

⑥H.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p. 276.

出过实践场的概念。”^①

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场”概念,亦即场域。“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②场域是指各种位置(独立的社会空间),位置里有关系,位置之间有关系。这种关系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突出表现为生产关系,尤其是剥削和压迫关系。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收益不同。那些处于中心位置、优越位置的人,收益大。反之,处于边缘位置的人,收益小。收益分配的不均衡,又固化了这种场域的存在。语义场域也是一种关系性的日常生活空间,既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又维护和再生产着这种生产关系。语义场域理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性思维方式,杜绝了抽象的结构主义思维逻辑。卡西尔说:“近代科学的标志就是关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狭隘得多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③

二、语义场域异化为信号场域

信号作为传递、运载消息的工具,自古就有。诸如烽火台的狼烟、求救的呼喊声,等等。资本主义信号场域已经取代了神学、理性主义和人性论,成为新的“普照之光”,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1. 信号瓦解语义场域的生活意义

信号在资本主义语义场域中霸权地位的确立,是“指涉物消失”的结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在古代语义场域中语义、意识的内容是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主观映像。能指和所指具有一致性,象征、形象、符号、信号等语言符号皆未脱离现实的指称物。古代的象征符号与日常生活的物体密切相关。迷宫作为一种常见的象征,就源自于宫殿、城堡、避难所、掩体等具象事物。^④

1400年前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诞生。其中,抽象劳动控制了具体劳动,抽象价值、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一切事物均被抽象为同质性商品或者消费符码。它的语义场域被元语言控制,致使指涉物消失。列斐伏尔的元语言概念源自尼采和萨拉·考夫曼的思想。元语言一词的前缀“元”(meta-)意味着“事后的”。元语言类似于罗兰·巴特的第二层级能指过程,是对第一层次语言的隐喻和转喻,属于第二层次语言。^⑤信号是典型的元语言,例如信号灯。在第一层次语言中,信号灯的词汇和读音是能指,灯具是所指、指涉物;在第二层次语言中,信号灯是能指,不同颜色灯光表达的意义是所指。信号灯与意义结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新语言符号,即无限制地滋生意义的元语言。红灯停、绿灯行和黄灯等待的意义、所指,与灯具本身即指涉物无关。也就是说,信号与载体无关,完全是任意的。铃声也可以被赋予开始和结束的意义,起到与信号灯一样的效果。喷香水同样有效。“人们随意地拿一个事物作为一种信号,在这种信号中,借助这种信号,意义与这个事物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⑥

2. 信号泯灭人的主体性

列斐伏尔的语义场域理论从信号霸权视角,批判了资本主义泯灭和瓦解主体的语言异化现象,继承和发展了米歇尔·福柯“人之死”的观点。

信号逻辑本质上是二元分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逻辑,“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或者,

①张一兵:《社会空间的关系性和历史性——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②[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③[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页。

④[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344页。

⑤[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202页。

⑥[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第474页。

或者”。^① 信号发出的指令不但简单、明确,而且具有稳定性,拒绝模棱两可。信号只能面对单一的感官器官,或是视觉的,或是听觉的。信号的改变会令人迷惑,将对一系列现成的和稳定的社会行动造成干扰,例如道路或轨道交通。信号大体上是恒定不变的、循环的和自动的,总是在那儿。它按照规定的频率工作,发出禁止或者允许、包括或者排除的命令,不受任何意识选择的干扰。信号没有给出任何信息,或者给出非常少的信息。信号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它无限地重复自己,即使无人在它面前。它充满冗余,没有传递过多信息,让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单调和陈腐。

信号让主动的“主体”外在化和被动,像一个受控制的惰性客体或者牵线木偶。信号并非完全外在于作用的人,而是产生了一个确定的效果,即情境制约。红灯亮时,人们停下来。绿灯亮时,人们继续前进,连想都不用想。人们只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也就是说,人们在信号的反复刺激下,已经生成了“惯习”(habitus)。“惯习”异质于“习惯”(habit)，“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和性格倾向;^②“习惯”是人们外在的、习以为常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惯习”决定和生成“习惯”。“一旦我了解了它们,这些信号就从头到脚地融入了我的血液中,服从确定的实践,与一种或若干确定技术相联系。”^③概而言之,信号取消了人的主体性,把人降格为毫无激情和创造性意识的动物或机器,肢解其为支离破碎的片面人。“人是一个整体,但是人被肢解成了碎片,这些碎片像人一样,也懂得痛苦和愉悦。”^④

3. 信号传达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命令,生成“恐怖主义社会”

信号装置表面上像一个单独的事物那样处于孤立状态,但是它在本质上并非独处。任何一个单独的信号装置,都是一个确定的(有规则的)系统的一部分。例如,高速公路规则、铁路信号系统或其他更神秘的系统。对一个系统深思熟虑后,一个系统可以变得非常一般化,甚至能达到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程度,例如道路信号系统或莫尔斯码系统。信号系统并非像一棵树、一株草那样毫无理由地、随意地产生出来,而是国家权力和统治阶级的创造物。信号表达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

人们若违背信号的指示和命令,就要被迫承受国家相关部门的相应处罚。信号符码规训和惩罚系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列斐伏尔称之为“恐怖主义社会”。它意味着外部的、局部的、有形的、榨取剩余价值的物质性统治,被内在的、全面的、隐形的符号暴力控制取代,外在的压迫被内在的自我压抑所替代。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破碎了,变成了大量过剩的信号化次体系,就像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中展示的那些高级时尚的世界,没有真实的统一体或者参照系。结果是令人困惑的悖论:“人们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倍感孤独,拥有海量的信息沟通渠道却鲜有交流,交流活动既在场又缺场。”^⑤一方面“恐怖主义社会”的信息量剧增;另一方面人们因缺少信息交流和语言沟通,滋生了越来越多的孤独感。于是,日常生活的语义场域成了意义的“零度点”。“零度点”是社会经验的最低点,即一个只能接近而永远达不到的点,或者说是一个彻底的冷点。^⑥ 在这里,孤零零的相互隔绝的信号符码使得日常生活徒有其表、形同虚设,颇像一座被抛置一旁,从而显得遥不可及的冰山。

三、语义场域复归为“艺术的语义场域”

日常生活及其语义场域是国家权力竖立其上的经济基础,唯有通过持久的“总体性革命”变革经

①[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第473页。

②[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70页。

③[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第474页。

④[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05—206页。

⑤H.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p. 185.

⑥H.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p. 185.

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推翻压迫和规训人的宏观和微观权力。“总体性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在经济上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用取用代替支配,用需要取代命令,用使用价值取代交换价值”;^①在政治上废除国家,实行自治;在文化上“让日常生活变成一种艺术品”,^②用艺术语言取代信号符码,强调口语和方言的重要作用,凸显象征和形象的核心地位,以诗创实践为手段,构建一个洋溢着情感和激情、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性语义场域。

1. 强调口语、言说的重要作用,构建“会说话的”艺术性语义场域

语义场域的意义生成是各种词语符号和非词语符号合力作用的结果。列斐伏尔贬低书写语言的作用,因为它是远离现实的关于“暴力、恐怖主义和控制”的语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神秘化自身力量的单向交流方式。^③他坚持“口语中心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德里达的结构主义语言观,旨在消除符号与意义的断裂状态。在《声音与现象》和《书写学》两部著作中,德里达将“声音中心主义”视为形而上学的观点。德里达认为,口语实质上是一种书面语言,因为它依靠一种差异系统和语言表达系统连接意义和符号,口语对交流信息的误传要比书写语言多。^④

口语与日常生活和具体事物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是对现实事物初次隐喻和转喻的结果。口语的能指与指涉物密切相关,是个人化的和直接的表达过程。口语是人们情感的流露和直接表达,基于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力比多”和剩余能量的释放和自然流露。方言、童谣、民歌、地方戏曲等,是口语的重要载体。在前现代社会人们聆听口语是获取知识、文化的主导性渠道,异质于现代社会的纯粹视觉刺激手段,诸如书写语言、电视与摄影等。“言谈要比语言体系、书写语言、阅读语言更具创造性。行动的语言与口头语是有创造性的,它们让那些像磨光了压花的旧币一般的符号与概念重新焕发出生命力。”^⑤孔子的《论语》、柏拉图的几乎所有著作、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主要由言语谋篇布局、表达意义。此外,口语依托面对面的交流语境,其意义生成与身体语言、社会地位、环境因素等密切相关。例如口语中“关窗”的命令,即使不说出,在一定的言说环境中也可以表达。一个老派的英国贵族,坐在安乐椅上读着一份报纸,也许只要对仆人说句“你不觉得天气有点冷了吗?”仆人就会关上窗户。^⑥

在海德格尔那里,口语、方言是朴素的和本真的语言;方言不是人的语言,而是大地之语,即人替大地说话;方言与日常生活的场域联系在一起,是大地的话语;方言意味着人的“栖居”。列斐伏尔认为,“语言,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同时也就只是存在的栖居”^⑦;口语、方言除了有“栖居”的本体论意义之外,还具有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意蕴,包括闲言碎语、家长里短、老生常谈等陈腐意义的日常语言形式。不过,在陈腐的、令人厌倦的日常语言形式中蕴含着神奇的因素。“除开老生常谈的一般话语之外,词汇、词汇秩序和词汇衔接会不断提供某些新意。”^⑧总之,以口语为主要组成元素的“艺术的语义场域”充满感情,贴近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活生生的、会说话的表征性空间。“表征性空间是有生命力的,它会说话。它有一个情感的内核或中心:自我、床、卧室;或者广场、教堂、墓地。它包含了情感的轨迹、活动的场所以及亲历的情境。”^⑨

①J. W. Freiberg,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1979, p. 294.

②S.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Publishers, 2004, p. 119.

③M.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From Sartre to Althuss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52.

④M.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From Sartre to Althusser*, p. 252.

⑤[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203页。

⑥[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95页。

⑦[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177页。

⑧[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第477页。

⑨[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64页。

2. 凸出象征和形象的核心地位,构建“情感流溢的”艺术性语义场域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可能以抽象的思维或理性的语言开始,必须要经过神话和诗歌的象征语言的时代。维柯认为,“各原始民族不是以概念而是以诗的形象来思维的,他们说的是寓言,写的是象形文字。”^①帕尔泰农神殿的中楣、巴赫的弥撒曲、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既非单纯再现的语言形式,亦非单纯表现的语言形式。在一个新的更深刻的意义上,它们都是包含着生动形象和深刻象征意义的艺术作品。象征与形象是合二而一的关系,形象是象征的载体,象征是形象传达的意义。依据“回溯—前进法”,加之借鉴尼采的思想,列斐伏尔将古希腊神话故事中酒神和日神,视为构建“艺术性语义场域”所必须模仿或者重现的经典形象。形象具有时间性,承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形象把通过经验获得的过去投影到未来上,通常从某种极端古老的东西起步,表达最远的不可能/可能的王国。”^②

在黄金时代的农村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节日生活的语义场域里,形象和象征占据着核心地位。古希腊有许多节日,诸如花月节、泰勒斯节、还愿节等。人们过节的目的是期盼未来的美好生活,例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身体健康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日神”形象的化身,呈现出“日神”的象征意义:梦幻般的精神状态。由于节日期间花销巨大,每一个人都要做出“献祭”,包括金钱、鸡蛋、酒水等。“献祭”不只是贡献财物,还极具象征意义:贡品越多,魔力越大;拒绝提供贡品的人,“他家的地会干枯,畜群会发瘟”^③。希腊文“象征”一词的始源意义具有浓厚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色彩,意味着首先“付出你的那一份”,然后才能参与到有魔力的行动和有效力的仪式中。^④在节日这一天,人们拿出所有积蓄,真诚地欢迎客人和陌生人。人们展现出“酒神”的形象:没有任何限制的恶作剧游戏、吃喝狂欢、欢歌劲舞。“酒神”象征着悲剧性结局,因为这些一无所有的人们,即将面临一场灾难和危机:严冬或酷暑,一场暴风雨或一场瘟疫。此外,“酒神”还象征着冒险精神。人们认为短暂的狂欢生活,值得冒险,“在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兴高采烈的需要,狂欢几个小时的需要,如何可以与不详的预感与担心结合在一起?”“节日就是一个风险,一个给未来下的赌注。”^⑤因此,未来的语义场域是古希腊语义场域的模仿和重现,带有强烈的艺术色彩。“艺术并不是对经验世界的描绘或复写,而是情感和感情的流溢。”^⑥

3. 以“诗创实践”为手段,构建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性语义场域

为区别于异化意义的实践(praxis)概念,列斐伏尔提出了具有原现象意义的诗创实践(poësis)概念。它源自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实践概念,深受海德格尔“栖居”思想的影响。^⑦实践意味着生产各种产品的重复性劳动。诗创实践意味着人将自身的自由自觉本质对象化的活动,即人们“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⑧的情境创造活动,并不局限于通过重复的工具性活动而对外部自然界的一种功用性改造,还包括“爱、激情,身体,感受——充沛过剩的创造力、冲动激动与想象实践……诗创实践”^⑨。人的身体是诗创活动的主体,身体通过行动“占有”文化符号的资源及其物质环境。^⑩诗创实践的结果是作品,即各种艺术品般的事物,诸如人类文明创造的城市、乡村景观、手工艺品等。

①[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12—213页。

②[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第482页。

③[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第188页。

④[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第188页。

⑤[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第187页。

⑥[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94页。

⑦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3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⑨R.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100.

⑩R.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p. 123.

在诗创实践中,在场是既定的,不受生产关系影响。“身体”置身于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范围之外。在诗创实践中,人们似乎处于酒醉的状态,主要用身体、形体表达自己的本质力量、宣泄情感。诗创实践用象征、形象、符号等诗性语言,创造带有诗意的语义,以抵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力。“语言是一种集体的作品——一种诗创作品,人们通过它占有意义和表达自我。”^①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试图利用三元辩证法的“亦此亦彼”逻辑,找出一种介于感性标记和抽象符码之间的诗性语言,创造出带有诗意的语境,以克服语言拜物教对人们身体和思想的控制。这种充满诗意的语义场域,“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象征体系,与艺术相关联(艺术也许最终更多地作为表征性空间的符码而不是空间的符码而被规定)”^②。

四、“一带一路”语义场域的出场逻辑

历经十年的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如同一幅蓝图或者山水画,已经从谋篇布局、勾勒框架的“大写意”,变成了巧密精细的“工笔画”,正在朝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然而,“一带一路”语义场域的建设进程却滞后于物理场域。在一定程度上,西方话语主导着“一带一路”的语义场域。西方话语将“一带一路”与“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论”挂钩,将其等同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歪曲了中国的政策。一些别有用心国际媒体用所谓“掠夺资源”“缺乏环境意识”等谎言,妖魔化了中国企业的形象。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话语权,容易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和控制,致使一些“一带一路”项目折戟海外市场,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2011年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被迫停工,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06年,在缅方邀请下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意向投资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水电项目。2009年,中缅两国政府签署了合作开发的框架协议。这是当时中国在海外投资的最大水电项目,总投资近300亿美元,规划总装机容量约215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约1000亿千瓦时。该项目规划建设7座电站,其中密松水电站规模最大,装机容量60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294亿千瓦时,总投资约80亿美元。水电项目采用国际通行的BOT开发模式,在特许经营50年的权限后转交给缅方。在特许经营期内,缅方大约获得540亿美元的丰厚收益。由于密松水电站有着较好的开发条件,在特许经营期内缅方大约能获得180亿美元利润,约占项目总收益的1/3。^③这原本是一个互利双赢的优质合作项目,却被国内外舆论硬生生地炒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劣质项目,以致被停工,造成了中缅双方的巨大损失。

围绕着密松水电站的建设与否问题,不同的政治团体,有着极其复杂的政治和利益诉求。缅甸政府、缅甸全国民盟、克钦民族地方势力、西方国家等政治力量,依托相关媒体纷纷发声,形成了密松水电站项目的语义场域。《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BBC等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密松项目,并在报道中批评该项目缺乏透明度。缅甸的《十一周刊》《伊洛瓦底新闻》《密支那新闻》等主要媒体发表文章反对修建密松大坝,理由是它会产生许多问题,诸如地震溃坝、洪水灾害、文物古迹被淹没、移民安置问题等。与此同时,关于密松项目的谣言四起:水电站会令伊江断流,以后只能骑摩托车过江;密松大坝是为了满足云南的电力需求,因为云南将建立一个工业区,需要大量电力;等等。事实上,对于水电站对环境的影响,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的做法远远高出了缅甸的法律要求。2009年,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委托长江设计公司、缅甸生物多样性及自然保护联盟共同开展伊江水电开发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0年5月完成了《伊江上游水电开发环境影响报告书》,专家评价结

^①R.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p. 123.

^②[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51页。

^③龙永图:《“一带一路”案例实践与风险防范·政治安全篇》,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年,第21—22页。

论认为伊江上游水电开发不存在环境制约因素,在环境影响方面是可行的。但是此前主要只和政府部门进行沟通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缺乏应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诉求的经验,针对这些质疑和反对声音,未能及时地予以合理的回应和解释,以致在密松语义场中被塑造成了“环境破坏者”的消极形象,为项目被迫停工埋下了伏笔。^① 2011年9月30日,吴登盛宣布暂停建设密松水电站项目。其理由是“破坏密松自然景观,破坏当地人民生计,破坏民间资本栽培的橡胶种植园和庄稼,气候变化造成的大坝坍塌也会损害电站附近和下游居民的生计”^②。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一带一路”的社会实践迫切要求构建“一带一路”语义场域,以消除谎言带来的阻力和障碍。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③鉴于此,构建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带一路”语义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呼唤和实践的要求。

五、“一带一路”语义场域的构建路径

“一带一路”不只是畅通“双循环”的经济空间,更是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空间即语义场域。习近平总书记说:“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是共同构建一个美好生活世界,即一个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⑤ 这个带有原现象、“事情本身”意蕴的美好生活世界构成了“一带一路”语义场域的核心语义,存在于中国的形象、象征、符号和信号之中,并由它们共同展现出来。

1. 用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昭示未来的美好生活世界

世界是人类群体形象的物化、具象化。现存旧世界是资产阶级模仿自己的形象、面貌(image),生产和创造的剥削性社会空间。“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⑥资产阶级的形象即“吸血鬼”,具象为贪得无厌的资本家、烧杀掠夺的侵略者、贩卖黑人奴隶的人贩子等,遍布于资本主义世界及其语义场域里。资产阶级的“吸血鬼”形象,一方面生成了资本主义语义场域的弱肉强食、烧杀掠夺等意义,另一方面也被铭刻在被压迫民众的心灵中,积淀为畏惧和害怕的潜意识。面对中国的崛起,有一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形象,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⑦

形象具有时间性、一维持续性,连接过去、现在,昭示未来。在波斯商人和欧洲传教士眼里,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等典籍中,古代中国形象是一个富庶的、爱好和平的礼仪之邦。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从来没有称霸世界、侵略他人的基因。相反,热爱和平、与人为善、协和万邦的文化基因,永远流淌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里,代代相传。遭受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中国人民不仅拒绝所谓的“国强必霸”逻辑,而且热烈欢迎世界各国搭乘我们的“便车”“顺风车”,达到实现工业化的目的,充分展现出文明大国形

①龙永图:《“一带一路”案例实践与风险防范·政治安全篇》,第25页。

②龙永图:《“一带一路”案例实践与风险防范·政治安全篇》,第28页。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④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10页。

⑤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10—51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⑦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88页。

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形象昭示未来,未来是现在的继续和发展。未来的美好生活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亦即世界各国人民模仿自己的形象包括中国人民的形象共同创造出来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空间。习近平总书记说:“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①

2. 用纪念碑式中国象征表达美好生活世界的意蕴

象征是指被赋予了某种意义的具体事物,各种具有相同象征意义的事物组成象征体系。象征的意义依靠法律文件、风俗习惯、祭拜仪式等方式被固定于某物。大凡承载象征意义的事物,皆是作品。作品是诗创实践或者“筑造”的产物,例如天安门是一种艺术品般的建筑形式,更是一种意义中心、一种精神象征、一套观念体系。实际上,不仅是天安门,而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包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在内的一个空间整体,构成了天安门象征体系。^②“象征以复杂的方式发出命令或禁令,这些复杂的方式是很有意义的,有时隐含了一种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理论。”^③

“一带一路”空间中的生产和创造活动,属于诗创实践的范畴,遵循真、善、美的客观规律。相反,资本主义殖民掠夺活动是异化的实践,只遵循价值规律,将交换价值置于使用价值之上。实践创造的产品,只在空间中反复循环,不会生成任何象征意义。诗创实践将使用价值置于交换价值之上,生产和创造的是作品。作品不仅存在于空间中,而且自身能生产和创造空间,并赋予空间某种象征意义。因为作品具有强烈的物性,异质于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和理由的产品、商品,类似于一棵树、一朵花或者一枚果实,没有价值增殖的原因和理由。“一朵玫瑰花并没有‘为何’或‘因此’之类的问题,它绽放仅仅就是绽放。借用西里西乌斯的话来说,‘它不在乎它是否被看见’。”^④物的本性是聚集,如同锋利的矛尖一样能汇集、创造出一个“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本真世界。

在“一带一路”的诗创实践过程中,中国工人与沿线各国人民通过高超智慧的辛勤劳动,顺应客观规律,将冰冷的砖头、瓦块、混凝土结合在一起,建造成带有情感、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例如高楼大厦、道路桥梁、水(核)电站,等等。中国建造的一些标志性建筑,诸如肯尼亚莫伊体育中心、科威特中央银行新总部大楼等,均是纪念碑式的艺术作品。它们的精美图案都已经被印刷在所在国货币上,成为人民自豪和骄傲的象征。^⑤它们作为具有强烈物性的作品,以自身为中心构造出了一个美好的生活世界。泰国的拉玛八世皇大桥如同海德格尔的“桥”一样,汇集了“天地神人”:桥贯通两岸和天地,不仅连接了村庄、城市、寺庙等,把广阔的后方河岸风景带向前来,而且为无常的天气做好了准备,高大的桥拱让冲天洪水漂流而去;飞架于两岸的桥,既完美地体现了力学原理、顺应了自然规律,又承载着那些期盼、憧憬美好生活的行人,将诸神^⑥带到面前。“桥以其独特的方式把天、地、神、人聚集于自身。”^⑦一件作品能汇集一个小世界,无数作品就能汇集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世界。“一带一路”的所有作品组成一个庞大的象征体系,象征着中国人民同沿线各国人民结下的友好情谊和未来的新世界秩序。

3. 用艺术性的中国语言表述美好生活世界

“一带一路”的日常生活是平静的,又蕴含着神奇和伟大的艺术元素。它表面上平淡无奇,实质上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认为,以丝绸之路为主线书写

^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24页。

^②张法:《建筑的象征——天安门体系与现代中国象征》,《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

^③[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第479页。

^④[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106页。

^⑤李元丽:《让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传遍全球》,《人民政协报》2021年12月14日,第7版。

^⑥“诸神”并非神仙鬼怪的形象,而是意指自然界的神秘规律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期盼。

^⑦[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196页。

的历史,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从4000年“丝绸之路的创建”到“宗教之路”,从“美国的丝绸之路”到世纪之交的“悲剧之路”,在整整25条路的基础上打造了今天新的“一带一路”。^①艺术源于日常生活,又高于日常生活。“一带一路”引领艺术家们的视野,从历史拓展到现实,从国内跨越到国际。从张骞出使西域开中国与西方及中亚、南亚交流之先河的“凿空之旅”,到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再到常年奋战在异国他乡创造感天动地故事的英雄人物形象,皆可以被尽情地描绘、刻画、讴歌。

艺术是“存在之真理”发生的始源性方式,艺术作品中蕴含着一个本真的世界或者存在。中国的舞蹈、戏曲、绘画、剪纸、歌曲、书法、文学作品等艺术形式,是承载和容纳美好生活世界的绝佳载体。艺术家们要站在全人类视角和时代的制高点上,张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学精神,用独具特色的中国语言描绘和升华“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修养。”^②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家、艺术家不仅有这样的雄心,而且有这样的能力,一定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③

4. 用精准的中国信号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信号是物联网社会的灵魂,唯有接受精确信号的指令,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的互联互通。中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生产了众多的先进信号,例如北斗卫星导航信号、移动通信5G信号、交通信号、生产信号,等等。2020年7月,北斗三号完成全球组网。它面向全球范围提供全球短报文通信(GSMC)、定位导航授时(RNSS)和国际搜救(SAR)服务。在中国和“一带一路”地区,提供区域短报文(RSMC)、地基增强(GAS)、星基增强(SBAS)、精密单点定位(PPP)和区域短报文(RSMC)服务。在亚太地区,它具备优于5米的定位精度、0.1米/秒的测速精度和10纳秒的授时精度。^④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基础性公共产品。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推广模式,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成了2600多个地基增强站,北斗相关产品和服务已输出到120余个国家和地区。^⑤目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例如,俄罗斯的电力巡检、泰国的仓储物流、柬埔寨的无人机监测、马尔代夫的海上打桩、缅甸的精准农业,等等。此外,北斗也正在成为大众消费产品定位功能的标准配置,诸如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北斗地基增强功能已进入了智能手机,华为手机的“高精度定位”服务,能以亚米级的定位精度识别出车辆的行驶车道。中国信号给“一带一路”插上了数字革命的翅膀,推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水平。相反,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遵循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总是将那些拥有落后技术的企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挖掘过时技术和产能的商业潜力,攫取高额利润。它们还通过技术霸权的方式,千方百计地遏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

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代表的中国信号,指引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奔向工业化的金光大道,进入到万物互联的社会。中国信号发出的指令,不仅让“一带一路”沿线的人民形成了“惯习”,即积极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而且生成了语义场域的核心语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欺凌和盘剥他国人民的敌人,而是实现合作共赢的亲密伙伴;未来世界是由各国人民共

①[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50页。

②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7页。

③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④韩立岩、陈建宇、姚婷:《北斗走出去,数字赋能“一带一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5期。

⑤韩立岩、陈建宇、姚婷:《北斗走出去,数字赋能“一带一路”》。

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

六、结 语

语义、意义,乃至意识形态,不只存在于抽象的书写语言里,也渗透在形象、象征和信号中,是各种语言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资产阶级在模仿自己的面貌,为自己生产世界的同时,也生产了蕴含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语义场域。一方面,资本主义语义场域的语义从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转化为语言拜物教;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语义场域竭力杜撰语义,用以贬低和丑化新社会空间及其语义场域,譬如编纂“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等谬论,致使沿线国家和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存在一定的质疑与误解,甚至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消极影响。显然,传统的单向度、宣传化、刻板化的话语已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产生了交流无奈、传播误解乃至极端对立。构建“一带一路”的语义场域,充分发挥中国形象、象征、符号和信号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是讲好中国故事、拓展“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举措。

(责任编辑:张 升)

Exploring the Approach to the Semantic Field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Analysis Based on Henri Lefebvre’s Semantic Field Theory

ZHANG Haifang

Abstract: Semantic field is a relational and meaningful space composed of symbols, images, signals, signs and other linguistic elements. In the semantic field of capitalism, signs have replaced theology, rationalism, and humanism as the new “illuminating light” that controls people’s daily lives. Some Western media deliberately demonize the image of Chinese companies with false accusations such as “plundering of resources” and “lack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leading to the failure of some Chinese projects in the overseas markets. The semantic fiel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major measure to decipher the semantic field of signs. The 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emantic field is to use a trustworthy, lovable and respectable image of China to show a better life world in the future; to employ monumental Chinese symbols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a better life world; to express the world of a better life in artistic Chinese language; and to use accurate Chinese signs to convey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semantic field; ar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out the author: ZHANG Haifang, PhD in History, is Research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